

“千年万岁，椒花颂声”何以连接古今

——唐昭容上官氏墓志引发公众共鸣的原因分析

吴丽



“千年万岁，椒花颂声”出自唐昭容上官氏墓志，为哀悼上官婉儿撰，是这方墓志中传播最广的一句祭文。近期由于《唐朝诡事录之长安》的演绎，这句祭文及背后的历史人物、故事再次受到关注并触动观众，由墓志内容改编的剧情桥段也受到广泛转载。这不禁让人疑惑，考古学中发现的墓志众多，其中不乏感情真挚、文辞精彩的祭文，上官婉儿墓志为何能获得公众特别偏好，如今又直接成为影视剧的创作素材。其背后有何魅力与动人之处？本文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

唐昭容上官氏墓志的发现与解读

唐昭容上官氏即上官婉儿，因墓志末称“婉儿”，只书“昭容”官名，故上官婉儿墓发掘者李明先生遵循古人文习惯将其命名为“唐昭容上官氏墓志”。上官婉儿是中国历史名人，也是盛唐前期最传奇的三位女性之一。但史书对这位传奇女性的记载却相当有限，语焉不详。2013年，唐昭容上官氏墓志的发现为进一步认识这位名人提供了线索。

上官婉儿墓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北杜镇邓村，此地在唐代称“洪渎原”，为长安贵族墓葬区。2013年6月考古勘探发现该墓，初步判断为唐代贵族墓葬，同年8月进行发掘，因在甬道发现青石墓志一合，确定该墓主人为上官婉儿。墓志呈正方形，由志盖与志石组成，志盖篆刻“大唐故昭容上官氏铭”，志文阴刻正书32行，982字。其中序文主要记述了上官婉儿的郡望、世系、简生平、葬地等信息，铭文由两则四字韵文组成，辞藻华丽，表示哀思悼念。目前学界对志文的讨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上官婉儿的郡望。志文称“婕妤（即上官婉儿）姓上官，陇西上邽人（甘肃天水）也”。《旧唐书》与《新唐书》记载其为陕州陕人（河南陕县），《元和志》说上官婉儿一族为东郡人（河南濮阳），但称上官氏总籍“陇西之上邽”。墓志如此撰写，可能是溯源祖籍，也有攀附郡望心理。

第二，上官婉儿的官职。志盖称上官婉儿为“昭容”，但文多称“婕妤”，上官婉儿葬时到底为何职位？墓志记载上官婉儿于神龙元年（705年）册为昭容，景龙三年（709年）表退为婕妤。昭容为皇帝九嫔二级，正二品阶，婕妤为正三品阶。李明先生认为上官婉儿葬礼规格符合正二品，但昭容为景云二年（711年）追复，此时距上官婉儿离世已经一年。这说明上官婉儿虽以二品制度安葬，但其时尚为婕妤，志文所云“皇鉴昭临，圣慈轸悼，爰制命，礼葬赠官”，直到一年后才实现。

第三，上官婉儿的政治立场。《旧唐书·上官昭容传》记载：“及韦庶人败，婉儿亦斩于旗下。”故上官婉儿一直以来被认为与韦后是一党。但志文用大量篇幅讲述了上官婉儿劝阻中宗立韦后之女为皇太女之事，表明其并非韦后同党。

第四，上官婉儿葬礼的实际运作者与出资人。唐代高等级墓葬一般由皇帝批准，朝廷出资修建。但该墓志却记载“太平公主哀伤，赙赠绢五百匹，遣使吊祭，词旨绸缪”。按照唐代墓志撰写惯例，志文撰写者通常会在序文中对墓志制作请托人进行点名奉承。太平出现在序文中，说明上官婉儿葬礼的运作者与出资人可能是她而非朝廷。

考古复原城市生命史

——郑州商城70年考古成果展札记

姚璐

1955年，一段商代城垣在郑州破土而出，揭开了这座早商都城沉睡数千年的秘密，这是当时在国内发现最早的一座有夯土城墙的商代都城遗址。之后的七十年间，考古工作者用手铲层层拨开历史的迷雾，为我们揭示了3600年前早商时期郑州商城先民的生活图景。

七十年栉风沐雨，考古发掘硕果累累。巍峨的城墙基址、庄严的青铜礼器、恢宏的宫殿遗存，连同带着烟火气的生活碎片，共同拼凑出郑州商城的辉煌过往。

20世纪的考古发掘，足以勾起很多“老郑州人”的生动回忆。1956年，经考古人员勘探，厘清郑州商城的形制和保存状况；1972年，郑州商城遗址工作组成立，先后对东城墙、西城墙、南城墙进行了解剖发掘，确认郑州商城城墙始建于商代二里岗期下层；1974年，张南街青铜器埋藏坑出土3件重量级青铜器，其中包括家喻户晓的杜岭一号、杜岭二号铜方鼎；1982年和1996年，在向阳回族食品厂青铜器埋藏坑和南顺城街埋藏坑又分别出土13件和12件青铜器组合，这三个商代前期晚段的青铜坑出土的青铜重器，推断为祭祀所用高等级礼器，为探讨商代都城的兴替提供了重要资料；1986年，在内城垣外多个地点发现外郭城遗迹，此后考古工作持续确认外郭城位置、形态和性质；1995年，发现东里路大型宫殿建筑群，给排水设施；2017年，伴随着郑州市区全面城市更新，“毫都古巷”“塔湾古街”“夕阳楼”“书院街南”“书院街北”“两院二期”等六大片区考古发掘工作相继开工，进入新时代，“考古+文旅”的新模式也呼之欲出；2021年至2023年在郑州商城中南部发现人工水系，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郑州商城商代早期最大的人工水系遗存，南部发现成排分布的大型夯土基址群，这些都为我们推断早商郑州布局增添新的有力证据；直到2025年，对郑州商城的发掘和研究仍在继续……

从国家到地方，对郑州商城的保护和传承的脚步也从未停止。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和新成果的发布，逐步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也极大提升了城市知名度。1961年，郑州商

由此，上官婉儿的生平已经较为清晰，她于麟德元年（664年）出生，13岁受到武则天赏识，擢为才人，此时尚为武周前。神龙元年（705年）被中宗册为昭容，由此进入政治活跃期。后因韦后欲立“皇太女”之事，表退为婕妤，应当在景龙二年或三年（708年、709年）之间。景云元年（710年）卒于唐隆政变，时年47岁。

公众对唐昭容上官氏墓志的理解

从《唐朝诡事录之长安》的创作倾向与观众热议内容来看，公众对墓志的关注点主要有三处：第一，上官婉儿与太平存在私交可能；第二，重构了上官婉儿的政治形象；第三，重构了太平与李隆基的形象。

首先，上官婉儿与太平公主作为政治盟友之外可能存在私交，这是出乎意料、也是最吸引大众的。试想一下武则天之后大唐最有权势的两位女性竟然是一对挚友而非政敌，这件事本身就足够震撼。因为二人身份足够特殊，太平身为女皇武则天之女，上官婉儿则因家族获罪自出生就是罪臣之后，其家族还是被武则天所杀，理应属不同阵营。并且，二人生长环境为宫廷而非普通民间，在这种特殊背景下出现一点真情很可贵，也不可思议。但墓志确实暗示了这种可能性，且据史书记载，太平出生于麟德二年（665年），与上官婉儿年纪相近。后者少年时成为武则天“秘书”，也具与太平接触的机会和条件。而后来中宗身亡，二人又共同草拟遗诏引相王辅政。所以，私交推论存在合理性。其次，墓志对上官婉儿政治形象的重构。如上文所见，上官婉儿在传统认知里属韦后同党，故唐隆政变时与韦氏一道被诛也并不奇怪。但墓志却透露了相反信息，“昭容泣血极谏，扣心竭诚，乞降纶言，将除蔓草”，此事应当发生于景龙二年或三年（708年或709年），“蔓草”指韦后势力，上官婉儿在此时力劝中宗清除韦后势力，并因此退为婕妤，说明中宗后期她与韦后一党已离心。但在唐隆政变中仍然被李隆基斩于旗下，令人唏嘘。再次，墓志让大众对太平与李隆基有了新认知。上官婉儿既已在景龙年间表明政治立场，唐隆政变时又率领宫人迎接李隆基，并出示草诏再表忠心，但最终还是难逃李隆基清算。太平显然对此不满，通过运作使朝廷颁布诏令认定上官婉儿冤死，并礼葬赠官，自己又派遣使者前往吊唁、赠送财物。除了表达对盟友的哀思之外，也攻击了李隆基的政治声誉。而李隆基诛杀盟友、太平礼葬盟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背后反映的不仅是唐代政治斗争的残酷与诡谲，还有人性的复杂。

最终，人们依据墓志内容建构了一个关于友情、政斗、复仇的故事：上官婉儿与太平年少相识，是同具远大志向的好友。中宗身亡之时二人联手，共拟遗诏以平衡大唐政局。唐隆政变时太平协助李隆基平定韦后之乱，上官婉儿被诛。太平高调为其料理后事，与李隆基的权力斗争因而激化。后来太平政斗失败，被李隆基赐死，不知葬身何处。两位惺惺相惜的传奇女性，最终都在政治斗争中以悲剧收场。

“千年万岁，椒花颂声”的人文魅力

由上文可见，上官婉儿墓志信息量大，关联历史复杂，涉及人物又都为历史名人，这很难不引起关注。但“名人效应”并不能解释公众视野为何聚焦于“千年万岁，椒花颂声”，这方墓志的独特还在于它的人文关怀。

“千年万岁，椒花颂声”出自墓志铭文第二则，原内容为：“瀟湘水断，宛委山倾。珠沉圆折，玉碎连城。甫瞻松槚，静仰坟茔。千年万岁，椒花颂声。”这是一段情感浓烈、文辞精彩的悼念韵文，符合唐代墓志撰写程式。一般学者分析墓志多以序文为参考，但对这方墓志序文的解读引起了公众对太平与上官婉儿关系的特别关注，铭文因而传播开来，这也说明文物的真正动人之处在于“情”。虽然太平操办上官婉儿葬礼的动机复杂，但其中蕴藏的情谊亦不能忽视。序文撰“太平公主哀伤”，遣使吊唁“词旨绸缪”，再结合学者的解读，“千年万岁，椒花颂声”这句祭文在人们看来，就不再只是表达哀思的程式化用语，而成为太平与上官婉儿情谊的象征，墓志则是物质载体。所以，人们了解这段历史并广泛传播墓志背后的故事，受到多种因素影响。

这个案例可以为当前文物阐释提供一些重要的启示。首先，科学、客观解读文物承载的信息是准确认识过去的前提，影视创作与大众的个性化理解都以此为基础。其次，应重视文物的历史背景。文物是历史与古代文化的物质载体，了解文物所关联的史实有助于认识文物的真正价值。再次，应重视解读文物的人文内涵。文物不仅是一种人工制品，也是关联古今的重要媒介。“千年万岁，椒花颂声”的传播与影视化说明，人们更希望通过文物看到生动的历史、鲜活的人、珍贵的情感，这就需要重视人文维度的文物解读。

结语

唐昭容上官氏墓志出土多年，相关研究已十分详尽，故近年已少有讨论。但公众却对此特别青睐，依据墓志内容与专家解读进行了大量创作与改编，极大程度传播了这段历史。仔细分析原因，可以发现这不单是一种“名人效应”，墓志本身承载的人文内涵也十分动人，是触动公众的重要因素。这种现象说明，重视文物人文内涵的阐释对古代历史与文化的传承有重要助益。

（附：文中图片分别采自李明、耿庆刚《唐昭容上官氏墓志》笺释——兼谈唐昭容上官氏墓相关问题》；段莹《唐上官婉儿墓志》。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1976年，武汉大学历史系正式设立考古专业。从筹建到招生，整个过程非常短暂，知晓个中原委和来龙去脉的人不多。本文试图根据一些档案、文件、回忆录等资料，厘清这一筹建过程，从中亦可窥见新中国考古事业发展的一些特点。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农业学大寨”等群众运动的深入，大量的文物暴露出来。当时湖北省考古力量相对薄弱，虽举办过短期培训班（主要是工农亦农人员），但完全无法适应形势的发展要求。因而，培养一批专业的文物考古人才就显得格外迫切。

在此背景下，1976年4月2日，武汉大学历史系和湖北省博物馆向武汉大学党委提交了《关于在武汉大学历史系开办考古博物专业的报告》。在得到校党委批准后，这份报告连同校党委的请示于1976年5月3日被送至湖北省教育局，编号“校革（1976）26号”（后称“26号文件”）。其中一个细节不同寻常，“26号文件”以及后续与考古专业筹建相关的报告，均同时呈报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写的韩宁夫。这一做法在谭维四的回忆文章中找到了原因：“在韩宁夫同志的亲切关怀下，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就这样顺利诞生了。”

应该说，当时武汉大学创建考古专业的条件并不成熟。在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的彭金章到武汉大学工作之前，历史专业的考古课由世界现代史教授张继平代讲。“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教学工作基本停止。70年代初，历史系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彭顺势被调入中国古代史教研室。那么，除了前文提及的大背景外，到底是什么直接原因导致武汉大学要立刻筹建考古专业，并且得到韩宁夫的支持呢？

谭文中说“1976年春夏之交……常有文物遭到破坏，却碰到没有专业力量去配合工程抢救文物的困难局面，深感忧虑，因而萌生了去武汉大学历史系，要求他们尽快开办考古专业的设想”。历史系领导热情支持，经双方商定，专业教师暂由湖北省博物馆派出，文物标本和陈列室也由省博物馆提供。由此可知，湖北省博物馆的积极要求是武汉大学考古专业得以迅速筹建的直接原因。“26号文件”拟定时，筹建事宜应已敲定。但据谭维四的回忆，之前双方还经历了大量的协商，中途甚至还有曲折。由此推断，湖北省博物馆可能早在1976年初甚至1975年，就已提出筹建考古专业的要求。

配合基建的考古任务繁重是70年代以来的常态。1973年，武汉大学历史系师生前后两次参与过湖北省博物馆主持的襄阳山湾和蔡坡东周墓地的发掘。当时并未提及考古专业筹建事宜，而于1976年初突然开启，则很可能与1975年的纪南城考古“大会战”有关。

江陵纪南城遗址的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但在70年代因大量基本建设而面临被破坏的危机。1975年2月，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在江陵纪南城配合农田基本建设进行文物保护和发掘工作的报告》，并获批准。3月，国家文物局与湖北省革委会组建“湖北省纪南城文物保护与考古发掘领导小组”，纪南城考古“大会战”正式展开。参与纪南城考古“大会战”的除了湖北的专业考古人员外，还有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家文物局文博研究所的专家以及上海等七省市的文博工作者。更为重要的是，包括北京大学等7所高校的考古专业师生也参加了发掘，而陈滋德曾于1975年亲赴湖北，并担任发掘领导小组副组长。因此，本文推测，筹建考古专业当时或已有讨论，但陈滋德与谭维四甚至韩宁夫等人仍有沟通。

1976年10月11日，在阳新龙港革命历史纪念馆召开的湖北省革命文物工作座谈会上，陈滋德曾于1975年亲赴湖北，并担任发掘领导小组副组长。因此，本文推测，筹建考古专业当时或已有讨论，但陈滋德与谭维四甚至韩宁夫等人仍有沟通。

1976年秋，武汉大学考古专业顺利在湖

业的情况反映》的油印文件，随文另附《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育革命方案（初稿）》。这两份文件疑为武汉大学历史系和湖北省博物馆向在京的文物考古管理等部门及相关领导所作的汇报。文件中提到，筹建专业存在的一些困难和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专职教师不够；设备短缺；图书资料不足；房间缺少。

而上述问题中，最为紧迫的是专业教师的缺乏，原历史系彭金章、杨范中和向绪成3名教师调入考古专业。杨范中以楚文化研究擅长，向绪成武汉大学72届历史系毕业并留系工作，调入考古专业后于1976年9月至1977年7月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进修班培训学习。此外，又从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考古所调来方酉生，从北京大学引进王光镐，从中山大学引进李龙章，这6人便是考古专业首批专职教员。另有7名兼职教员来自湖北省博物馆，包括谭维四、王劲、陈振裕、全锦文、孙启康、陈贤一、李天元；2名兼职教员是来自荆州市博物馆的陈跃钧、彭浩。

筹建工作同样得到国家文物局的支持。1976年6月7日，国家文物局文物处长陈滋德在周原文物保护和考古知识班现场经验交流会议上，谈及了武汉大学考古专业的筹建工作。陈从何途径得知筹建事宜并不清楚，因为国家文物局知晓此事是在1976年7月初谭维

四赴北京汇报工作之后。谭维四回到湖北后，武汉大学又向湖北省教育局提交了一份报告，里面说“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负责同志对武汉大学新办考古专业表示支持……希望省有关部门将此事书面报告教育部，抄送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以正式备案”。可见当时教育部和国家文物局官方对武汉大学筹建考古专业均不知情。但有一事值得注意，陈滋德曾于1975年亲赴湖北“大会战”时亲赴湖北，并担任发掘领导小组副组长。因此，本文推测，筹建考古专业当时或已有讨论，但陈滋德与谭维四甚至韩宁夫等人仍有沟通。

1976年10月11日，在阳新龙港革命历史纪念馆召开的湖北省革命文物工作座谈会上，陈滋德曾于1975年亲赴湖北，并担任发掘领导小组副组长。因此，本文推测，筹建考古专业当时或已有讨论，但陈滋德与谭维四甚至韩宁夫等人仍有沟通。

江陵纪南城遗址的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但在70年代因大量基本建设而面临被破坏的危机。1975年2月，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在江陵纪南城配合农田基本建设进行文物保护和发掘工作的报告》，并获批准。3月，国家文物局与湖北省革委会组建“湖北省纪南城文物保护与考古发掘领导小组”，纪南城考古“大会战”正式展开。参与纪南城考古“大会战”的除了湖北的专业考古人员外，还有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家文物局文博研究所的专家以及上海等七省市的文博工作者。更为重要的是，包括北京大学等7所高校的考古专业师生也参加了发掘，而陈滋德曾于1975年亲赴湖北，并担任发掘领导小组副组长。因此，本文推测，筹建考古专业当时或已有讨论，但陈滋德与谭维四甚至韩宁夫等人仍有沟通。

1976年秋，武汉大学考古专业顺利在湖

北省招收到18名首批学员。他们分别是崔新社、邓辉、丁美华、杜国柱、冯少龙、胡雅丽、李红柱、刘华才、王红星、王然、吴晓松、徐梦林、阎颇、余秀翠、院文清、张潮、周厚强、朱吉平。但囿于条件所限，首批学员并未于当年秋季到校上课，直到1977年2月24日正式入学。课程除了专业课外，还有形势任务教育、军体课和专题课等。专业课程包括文物政策法令、田野考古方法与技术、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商周考古等。专题课则有文物陈列、水文考古、边疆考古和民族学等。当然，实际因教师缺乏，大部分专题课都未能开课，而且许多专业课也由兼职教师甚至是邀请外单位专家临时授课。比如“旧石器时代考古”邀请北京大学吕遵谔授课；“隋唐宋元考古”则由湖北省博物馆全锦文和郑州市博物馆杨琛负责。此外，首届师生还于1977年4月至5月、9月至第二年1月，分别参加了郧西县白龙洞遗址和房县七里河遗址的田野实习。

平心而论，1976年武汉大学筹建考古专业的条件并不成熟，甚至可以说有些“仓促”。幸而在各方共同努力下，顺利地将专业建立起来，并一直延续发展，为中国考古学特别是湖北的考古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回望来时路，考古专业的筹建得益于各级主管部门领导特别是时任省委书记韩宁夫的鼎力支持，兄弟单位尤其是湖北省博物馆的无私帮助，当然，最重要的是历史系和考古专业工作人员的筚路蓝缕。个中艰辛，外人恐难尽知。谨以此文向在武汉大学考古专业筹建和发展过程中作出巨大贡献的人们致敬！

（附：本文在资料收集过程中得到王光镐、王然、彭蛟、汤超、袁飞勇等先生的帮助，在此致谢忱。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关于在武汉大学历史系开办考古博物专业的报告（第1页和最后1页）

关于新设考古博物专业改名为考古专业的报告

关于新设考古博物专业的请示报告

“一座城，三千年，城址未移，文脉不绝”，这是

本版责编：郭晓蓉 张宸